

全球女权主义
的比较案例研究
妇女的活动与学术研究
参与团队：中国

中文访谈文字稿
讲述者：乔伊林
访谈者：Joyce

地点：中国上海
日期：2019年10月22日

密歇根大学
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所

密歇根州安娜堡 1136 Lane Hall, 48109-1290

电话: (734) 764-9537
电子邮件: um.gfp@umich.edu
网站: <http://www.umich.edu/~glbfem>

版权所有：密歇根大学董事会, 2017

乔伊林，1987 年生于中国吉林农村。她于东北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取得社会学学士学位，后在英国国际发展学院（IDS）取得性别与发展硕士学位。2016 年 11 月她在上海发起了“我们与平权”女权主义小组，以公众号文章，线下讨论会与观影会，线上读书会，线上线上工作坊的形式尝试提升参与者的性别平等意识。并于 2019、2020 年各发布了一份以受访者为中心的关于性骚扰和性别歧视的访谈报告，旨在提升公众对于相关话题的了解和理解。此前她一直在私人公司从事人事相关工作。

Joyce 于纽约大学获得政治理论硕士学位，至今已在高校从事多元倡导工作超过六年。在其工作岗位上，Joyce 负责策划和组织面向国际大学生群体的活动和项目，旨在培养其多元文化意识，鼓励学生探讨社会正义有关议题、关注边缘身份和系统性不公，促进社群的融合和包容。在职业生活之外，Joyce 也是上海女权小组“我们与平权”的志愿者。她对性别、性取向、身体、种族等交叉议题感兴趣。

受访者 A，采访者 B

B: 我直接用最简短的话说出来，其实我想问的是，你个人的成长背景以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性别意识的？这样有点长了，我就先直接问，先介绍一下你的成长背景。

A: 好的，如果要从我的个人成长背景讲起，这个故事就是非常长的。我出生在中国东北的农村。在我小的时候呢，可能在我自己的字典里面，根本没有家暴这个词。我们那个村子里面，附近的老公打老婆跟家长打小孩，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好像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个家庭是家长不会打小孩的，可能有一些特别强的老婆，不会被老公打。然后，在我离开了东北之后，我才听说，原来中国东北是一个男权的、男性压迫女性、针对女性的暴力非常严重的一个重灾区。但是在我小的时候，我完全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这是正常的。然后我自己的成长背景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好像是一步一步地在推开迈向更大的世界的大门的样子。我小的时候，是先在一个村里面的小学读小学，之后转到镇上的小学，然后又转到了一个更好的镇上的小学，又转回了原来的镇上的小学。所以小学总共是有 3 个小学，转了 4 次。然后到镇上去读初中，高中是到市里面去读。在市里面读高中跟在镇里面读初中就已经是非常不一样的了。见识的东西非常得不一样，然后同学们的穿着呀，能够看到的书，接触到的东西，也都是非常不一样的。到了大学，我还是在东北读的，是在省会城市读的。那个时候也是，到了省会城市，跟我们那里的小城市也是不一样的，也是打开了一扇更大的大门。然后到了我大四要毕业的时候，我就一定要跟着我的一个好朋友来到上海，来算是实习跟创业。到了上海之后呢，我的感觉就是更加不一样了，这个城市跟我之前所有接触过的、在东北那个文化体系里面的都不一样。后来就留在了上海。我是什么时候接触到女权主义的？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前几天我翻出来了一个之前的笔记本，大概是在 2011 年还是 2012 年的时候，在我自己的日记本上写的是，一个女人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找到一个爱她的老公，和一个听话的孩子。现在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再去看这样子的笔记，就会觉得，原来我还有这样的时代吗。我现在能够想起来的，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是 2004 年到 2008 年，韩剧是在国内非常非常流行的，大概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蓝色生死恋、冬季恋歌这样的片子，开始流行起来，然后有这样一股韩流进中国来。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经常是去花一两块钱，到不同的阶梯教室去，看两个电影，大多数的时候都是会有一部韩剧，是那种爱情轻喜剧，或者爱情轻悲剧，然后还有一部大概是美国的电影，好莱坞的电影。那个时候就觉得，哇塞，就是韩剧里的这种感情真的很棒啊，这个男的都特别特别在乎这个女的，肯为她去死，而且还从来都不会说很多漂亮的情话，这个特别符合东北主流的价值观，就是一个男的应该爱你，应该不多说，他应该全心全意地为你好，哪怕你误会他也没关系。那个时候就觉得，如果这个是正常的、美好的感情模式的话，那我应该去找一个像韩剧里那样子的、对我特别好又没有很多话要说、当然很重要是要又高又帅的一个人作为我的男朋友。那个时候的感情观是这个样子的。然后等到我到上海后，一开始其实都是在忙于生计，就是希望能够赚比较多的钱，在上海这个城市立足。因为确实我有朋友是来到了上海，待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觉得这个城市没有办法立足。那我就挣扎着在这个城市算是立足下来了，然后希望能够爬上这个社会阶层的阶梯，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赚更多的钱，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有更多的话语权。然后就来到了一个尴尬的时候，就是我要 27 岁了，我已经骑上了那个剩女跟非剩女的那个墙上面了。那个时候，2014 年，我是刚刚开始感受到剩女这个词对我的压迫，以前只是影响。会有不同的同事来跟你说，我想要帮你介绍一下男朋友，你同意的话，当然好，但是基本上同事介绍的不会很靠谱。那你不同意的话，你收到的回复就是，你不要那么挑啊，你要穿得更漂亮一点，更性感一点啊，性格要更温柔一点啊，不要那么 aggressive，等等的这种类型的评价。然后到了 27 岁的时候，去外面的那种相亲类型的活

动，人家也开始要求你，1987年出生的不可以再来了，要1989年以后出生的才可以。那个时候才有感觉到，这其实已经达到了某一个我可能、我觉得不对的一个点。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有压迫这个词，然后就开始自己去寻求一个解决的方案。那我就觉得，我赚的钱也够多，我想要什么可以给自己买，我也不是需要另外一个人过来给我提供什么东西，我自己一个人可以生活得很好。那如果你们非得管我叫剩女的话，那我更宁愿是把剩女这个词赋予一个新的含义，就是我是一个独立女性，我是一个有高收入高学历的独立女性，我自己也可以生活得非常得好。那个时候是这样子想问题的，但是其实身边的这些影响还是一直都在的。可能可以去寻求的一个慰藉就是到另外一种文化的圈子里面去，比如说跟外国人相处，或者是不知道其他的什么。当时我自己的解决方案就是跟外国人相处，但是毕竟你不可能一直生活在那个文化圈子里面，你身边原有的社会关系都还是在的，所以这个压迫也是一直在的。然后在2016年的时候，刚刚好有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洪理达的新书，叫 *Leftover Women in China* 中国剩女这本书。当时我看完了之后，我就觉得，哇她说的好对啊，她说了几个点，一个点是说，leftover women 剩女这个词，它是一个在贬低跟物化女性的词，它没有把女性当做一个人、一个跟男性同等的人来看待。因为我们有剩女这样的词，但是我们却没有很多去强调剩男这个词。还有一个就是，她的观点是，剩女这个词是当时全国妇联在2007年创造出来、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把这些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全部都推回家去结婚跟生小孩的这样一个东西，就是一种统治的手段。那我当时看到了这个之后，我就觉得她说的好对，好中我的心啊，我所有的那种 sufferings 突然之间就找到了一个解释，就是其实是有一个更强大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可能会在压迫我们的力量，它在压迫我们这样一群女性，目的只是希望我们能够老实一点，维护这个社会的稳定，虽然我们并没有体现出来我们有多么危害这个社会的稳定。那个时候开始，因为这个，我觉得我一开始可能把剩女赋予一个独立女性的含义，其实是一种类似女权主义启蒙的思想。但我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女权主义是什么，我听都没听过女权主义，到了我去看中国剩女这个书的时候，我当时看的也是英文，然后我知道这个东西是属于 feminism 的，我再去有意识地去寻找跟 feminism 相关的一些书来看，一些论文来看，才知道有这样一个词叫做女权主义。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舆论环境，还是一直污名化女权主义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并没有非常认同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在我一开始去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是2014年的时候读的这本书，那个时候不认同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也不明白女权主义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有了这种比较朴素的、功利的、要给自己的困境提供一个解决方案的类型的女权主义启蒙思想。然后在慢慢地去找一些媒体的报道、论文跟书籍去阅读、去学习的过程之中，才慢慢地开始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然后真正我认同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大概是在2016年，在我大概快要开始这个我们与平权这个项目的时候开始认同的。而且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当时认同的女权主义跟我现在认同的是非常不一样的。

B: 你能说一下当时认同的女权主义是怎么样的吗？

A: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的背景是这个样子的，我在2008年毕业的时候，首先是加入到猎头公司工作，主要做的还是一些外资的公司，然后我自己是一直在服务于一些外资的快速消费品公司的，直到我后来去做了 in house 的 hr 之后，也是服务于一些外资的消费品公司。我觉得在这样子的公司里面，你需要非常强烈地去拥抱那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你才能够生活得非常好。那我既然能够一步一步地往上走，就证明我已经在一直拥抱这个、可能已经抱到我的骨子里去的这种思想。所以我一开始认同女权主义这个思想的时候，我认同的是一种比较 lean in 类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女权主义思想。那这种思想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家暴的妇女，你在一段如此糟糕的关系里面，你一直被打，一直被精神虐待，被经济上面虐待，你还不离开，即使我不知道我当时会不会责怪这些受暴的妇女，我心里肯定是有一部分是责怪她们的。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是有一种很功利的心态在，还是在解决自己的困境。

所以我的女权主义是由我自己出发的。我不会去考虑，我也没有办法去把自己放在那样的角度去考虑身处于其他困境的妇女、她们所遭受的一些问题。所以那个是一种功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lean in 类型的女权主义。那我也不能说我现在的女权主义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女权主义，现在的我更能够了解社会达尔文主义它本身就是一个资本主义陷阱，它是一个圈套。女权主义应该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它之所以叫女权主义是因为女性的权利在长久的历史、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没有得到，女性的权利都没有被当成一个人一样给予她一些最基本的人权，所以它才叫做女权主义。

B: 你现在还回东北吗？

A: 大概是在六年前回过一次。已经六年没有回过东北了。

B: 这个里面，除了家庭、个人的原因，是不是也有一种再回去可能很难适应那种从小看到的文化环境的感受？

A: 现在的东北，跟我小时候看到的东北也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中国的发展确实是非常快的，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在我小的时候，我们的经济状况，我自己家的经济状况算是比较好的，但是其实也只是在贫困线上挣扎而已。有那种非常差的家庭，可能是三口之家，因为独生子女的原因，三口之家一年的平均收入，大概只有两三千块人民币。我说的这个以前，大概是 95 年到 00 年中间这段时间。然后，吃不起肉，但是可能因为是在农村里，肯定是有菜的，但不可能在冬天吃到反季的蔬菜，不管是运输条件的问题还是其它的问题，还是自己经济条件的问题，都是没有办法吃到新鲜蔬菜的，只能吃白菜土豆、腌酸菜这种类型的东西。在我上次回去的时候，因为我要办护照跟身份证，那个时候上海还不能办。我就尝试从镇里面往农村的方向走，发现以前我们的那个路是黄沙路，可能你们都没见过，车一过去的时候，是尘土飞扬，因为它不是柏油路，它上面都是黄沙，是一直要往上面铺沙子的，现在都变成了很宽的柏油路。很多原本的平房已经建成了楼房。我没有机会走得更深更进去，但是从长辈的那一边听说是，每一年农民是有一些补贴的，这些补贴相对来说会给她们很大的生活条件的改善。而且真的是大多数的人已经出去打工了。

B: 那从性别这方面来说，你没有回到老家，但是继续跟你家里面人保持联系，你感觉从家庭这个层面来看，性别文化有改变吗？

A: 我自己的家庭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家庭，但是从其他的一些，关系比较近的亲戚的那种回复里面，基本上想法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首先，农村的这些父母，他们首先有一个要求，希望家里的小孩读书读得好，希望你能够到比较好的学校去。我当时考的只是一个省内的 211 的学校，那都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学校了。在你接受了教育之后，我小的时候，我有听到过说，家里面有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是超生的那种，最后让弟弟去上学，让姐姐打工，这种情况是有的，当时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对或不对。因为它跟我没什么关系，我是独生女，我是那个会去上学的，我们家里面对于教育也是特别在意的。我自己的亲戚家里也是对于小孩的教育特别在意的，没有那种会让一个小孩不上学，根据性别来选择谁去上学这种事情。但是在毕业之后，我一直能够感觉到的就是，我有一个特别近的女性亲属，她会一直不断地来催促我找男朋友，特别是我现在已经 30 多岁了，可能现在有一点放弃了。在我 30 岁前后的时候，会非常希望我能赶快找一个男朋友好定下来、安稳下来。这种想法其实是挺有意思的，一个是，她不是希望你去找一个男的去依靠他，让他来赚钱，就在家相夫教子就算了，因为她自己的孩子，也不是这个样子做的，女方可能赚得比男方还要多。但是呢，她又希望你能够不管是在精神上还是情绪上还是什么上面一定要有一个男人，在你的家庭里面，才能让你安定下来。可能就是觉得一个人没有办法安定下来。我觉得这个想法是特别朴素的过去的集体主义的一种想法。你要跟一个男人在一起才能够安稳，你要有一个家庭，你才能安稳。我觉得一个人也可以安稳呀，假如真的是追求安稳这件事情的话。

B: 为什么你觉得这是一个集体主义的想法？

A: 因为我从她那个角度来想, 以前的时候是, 如果你没有结婚的话, 你就没办法分房子。你要有房子, 有米面粮票什么的, 还有单位发给你的福利也会不一样, 还有很多的東西。这样的话, 结婚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好处和福利, 你的生活会变得更好。这个是因为她当时是有单位的, 我的这位女性亲属。但我自己的家长, 不会这样子考虑。她只是觉得, 你应该找一个男朋友, 但是为什么呢? 没有为什么。她可能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所有的其他的家长都劝自己的孩子要赶快找一个男朋友或女朋友, 特别是一个女的你都已经过了 30 了, 已经特别老了, 在婚恋市场上的价值。我觉得我的家长不会考虑这么深入的东西, 什么婚恋市场上的价值。就是别人的家长都在催, 你也应该被我催一催。

B: 那你刚刚说你现在拥抱的女权主义跟刚刚创建我们与平权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过程又是怎么发生的, 然后你在聊这个的时候也聊一下组织的变化。

A: 我先讲一下我是怎么开始做这件事的吧。我在大概 2016 年 7 月份的时候, 离开了我原本的这一家外资公司, 就不再做人事的工作, 不再给资本主义打工了。然后加入了一家在上海的也是外国人做的一个社会型企业, 那个时间其实是因为我在 2015 年回国工作开始, 就一直在寻找各种各样的可以去做义工的机会。因为我很想要做一些造福于社会的事情。我不知道这个思想具体是从哪里来的。

小歇

B: 你刚才说到, 现在你拥抱的女权主义思想跟你刚创建这个组织的时候已经很不一样了, 你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 然后在聊这个的过程中, 你介绍一下这个组织的创建和发展的过程。

A: 我先讲一下这个组织是怎么开始的吧。那是在我 2015 年回国开始工作以后, 我就一直是在很有意识地去寻找一些慈善的组织, 希望能给她们做一些志工的工作。在做这个志工工作的同时, 也希望能够找到自己最感兴趣的点, 也希望自己以后能做一个, 不管是慈善组织, 还是去给慈善组织打工, 还是自己做一个社会型企业这种类型的项目。在那个时候, 我能够想到的比较多的, 还都是跟教育相关的。首先是因为我自己的出身, 我是非常非常相信教育的, 因为没有教育就没有现在的我坐在这里跟你讲, 我也不可能去读洪理达的书, 我也不可能知道什么是女权主义。我现在具体是什么样子的, 我都没有办法想象。所以在一开始, 2015 年的时候, 大概就已经帮 3 个不同的组织做过教育相关的义工。但是我自己虽然对教育非常感兴趣, 我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觉得非常有意义, 但还是觉得有一些东西是缺失的。我觉得还是需要这个东西跟你自己的利益是 related 的, 你才能够更好地去实现自己想要做的那些东西。然后大概是在 2016 年的时候, 2016 年 7 月, 我就不再给资本主义打工了。我就去加入了一个在上海的外国人做的社会型企业的项目, 当时我去的时候的想法, 也是非常功利的, 就是希望跟着她们的创业团队一起来运营这个项目, 来学习怎样做一个社会型企业。我是 7 月份加入这家组织的, 在 11 月的时候, 当时做的这个项目是有一个场地的。2016 年的 11 月发生了一个改变全世界的大事, 就是 Trump 当选了。他上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 cut planned parenthood 的 budget, 那个时候在上海有一个华裔的美国女生, 她在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 马上就在上海、我们的场地主办了一个筹款的活动, 所有筹得的款项全部会捐给 planned parenthood, 这个 planned parenthood, 大家都知道是美国的一个非常大的关注女性健康跟生殖健康的组织。当时在筹备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是跟她对接的, 我主要也是负责一些跟 event 相关的工作。那个时候,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类似民族性的感觉吧, 我当时想的是, 一个美国人, 她都能够在中国做一个筹款的活动来给她在本国的一个针对女性健康的组织来筹款, 那我一个中国的女性, 我想做一点跟中国女性权益相关的事情, 为什么不马上开始呢? 那个时候呢, 我其实之前很久就已经有了一些想法, 是想要做一些传达平权意识的产品来做

一个社会型企业的项目。所以她做这个 fundraising 的时候，我就把这些产品印出来，先做了第一批的尝试性的售卖。那个时候也是自己跟自己下定了决心，之前做的这个公众号，也要每个星期都更新，所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做到了现在。

B: 公众号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A: 公众号其实是在 2016 年的 5 月份开始做的。

B: 就是在辞职之前就开始了。

A: 对，那个时候做了公众号，发的东西都是一些类似有点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写人写物的这种类型的东西。发的也特别少，特别是我刚刚做了这个公众号就辞职加入这个社会型企业了。我真的是非常的忙，根本没有什么时间来写、来更新。11 月的时候，就是借着这个机会，我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一直更新。现在回去看以前写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不成熟，粗糙，有一种朴素又好笑的情怀在里面。我刚刚也说了，我早期的思想是非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但那个时候我连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词都不知道。也是慢慢地不同的微信群里面跟大家的交流，加上自己有意地去找一些书来看，才知道了一种想法、这种倾向，才慢慢地去尝试改掉这个想法。因为这个想法是不对的，这个想法其实跟女权主义是不相容的，它并不遵循女权主义所倡导的人人平等的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几个事情，对我来说是影响非常大的。一个是从 2017 年的 5 月开始我们做线下的活动，就不再是线上的、有一些类似情绪化的吵架的交流，而是把这些交流搬到了线下。线下大家会面对面地就某一个话题来展开一些讨论，有时候会有一些争论。我觉得每一次去主持这些线下活动的时候，我都会得到非常多的东西，特别是在最初的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事，是在大概 2018 年还是 2017 年年初的时候，复旦开了一个课，王政老师的社会性别导论，2018 年开的。我就去上了这个课，总共课程的时间只有 8 周，但是课业是非常重的，每一周一节课 3 个小时，她要求你要读完一本书，因为我们这一节课要讨论这一本书。每次书籍的选取都是跟中国的女性相关的，都是一些非常不错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书。那是我第一次系统性地去学习社会性别，gender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来的，民族国家是什么，讲梁启超那个时代，他们讲的女学、女权是什么，还有霸权性话语，社会建构，这些东西。以前可能听过其中的一些词，但是那是第一次去真正理解这些到底都是些什么。我是觉得那 8 周是非常累的，因为每天晚上要看书看到一两点钟，要把它看完才能听得懂老师讲的是什么。但是真的是 8 周时间是一个让我对于性别这个东西的认识提升了非常多的一个课程。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对我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在我的性别认识方面。

B: 在 16 年的 5 月到 17 年的 6 月之间，都是只有微信上的文章，到了 6 月才开始有线下的活动。

A: 是 16 年的 11 月到 17 年的 5 月，一直都是只有公众号上面非常粗糙的文章。也是因为不太满足于线上的沟通跟交流，很多时候都是单向的交流。我觉得在微信上面真正能够达到沟通，是一个奢望。很多时候真的只是在自说自话，在进行沟通和交流。我当时可能没有这么深的想法，只是觉得这样不对、不好，我想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应该做一个线下的活动。那个时候也不会去想什么我要建立一个社群，可能社群这个词，这么高大上的词，从来都没有想过。但是也就是因为开始做了这个线下的活动之后，才慢慢地开始建立一个真正的社群。我觉得我们组织的发展的很多决定是我拍脑袋做出来的，就是这个开始做活动，就是觉得不行啊，我想要做活动，然后就开始做活动了。做了讨论会之后，就觉得，只有讨论会，好像有点干，是不是可以看看电影，因为我自己挺喜欢看电影的，而且有那么好的电影，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就 2017 年 8 月的时候就开始第一次观影会，看的是阴道独白，是 HBO 对 Eve Ensler 的一个纪录片。后面其他的一些讲座、心理互助小组，全部都是拍脑袋，当时觉得应该有这个东西，就得去做，然后就去做了，那成功了失败了这个事情就后面再说。现在比较规律性的还是在做观影会跟讨论会，讲座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应该也会慢慢

做成一个规律性的活动。

B: 刚开始做线下活动的时候，参加的人是一些什么样的人？跟现在的参加者有什么区别？

A: 很有意思的是，刚开始参加的人，还有一个现在是我们的志愿者呢，她其实是后来一直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刚开始来参加呢，我们还是跑过去谈了一个外国的餐厅，在陕西北路上面，去跟她谈，我们要做这样子的活动，不知道具体会有多少人，我们也没有钱给你做场地费，只能说劝大家去消费一下。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一次做活动的时候，来了7个人，她把二楼给了我们。二楼的场地，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我们是周二的晚上，来了7个人，我真的觉得是开心死了，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来，还想，是不是只有一个人来。大家讨论得还蛮开心的，我记得就是那次我认识了我采访的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女程序员，遭遇性骚扰跟职场性别歧视的故事。那个时候是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这些我经常，比如在网络上看到的、在媒体上面看到的事情，是真实存在的，存在在我们身边的人的身上。我觉得也是因为那次的经验，让我觉得这些故事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有力量的。它既然能够打动我，就能够打动其他人。所以就开始了做很多访谈，通过做访谈来传达很多跟性别相关的信息的形式。

B: 第一次讨论有主题吗？

A: 第一次讨论应该就是女权主义，女权主义者这种的。而且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性别，就是 gender 这个词它背后具体是什么含义。我只知道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要讨论女权主义。

B: 现在的参加者呢？

A: 现在的参加者呢，跟以前是有一定的分别的，但其实只是换了一批人，我觉得。我在那个时候，是有一种，我当时开始做这个项目也是因为，我尝试在上海找一些组织，希望能够有一些机会去，不管是给她做志愿者还是帮她工作都可以，希望去了解妇女组织具体都在做些什么，我真正认为的那个样子，是我想要去做的。我找了半年没有找到的情况下，在那个为 **planned parenthood** 筹款的事情的启发下，就开始做这件事情。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做这个活动来的这些人里面，其实是有一些人是有这方面的，我觉得她们的意识是比我还要深，比我还要强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好像也有很多人在关注这个，不是我一个人在关注这件事情，但是大家好像都是没有组织的。那现在呢，我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是，我们是这个组织，我们存在不管是什么样子，哪怕我们，虽然我们还是比较规律地在发文章，在做活动，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还存在在这里，是一个上海的在地的组织，对她们来说，就至少减少了我一开始寻找一个组织的那种迷茫。但来的人，我觉得其实是类似的，但现在的感觉是，那个时候是觉得，好像很少人了解，但是也是有人了解的，但是大家都是没有组织的。现在呢会觉得，好像有很多人都很了解，可能有很多人比我还要了解，这样子的想法，我自己的心态上是有一些变化的。

B: 有一个问题我本来是准备后面一点再问的，但是我觉得你前面已经多次提到了它，所以我想问，你最开始说，来到上海之后，特别是说到这个剩女的问题，自己年龄上感到一些压力，感觉得到周围有一些社会压力，可能是跟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一些期待跟规范根深蒂固的，你当时也说，你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更多地跟一些外国人在一起，然后包括你说到的你看的洪理达的书也好，还是说后来去参加很多志愿者组织的工作也好，认识的人也好，包括你第一次活动找的这个餐厅，是个外国餐厅，就感觉特别有意思，是不是因为有一种要急于逃离这种跟中国传统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束缚，所以觉得外国的这样一个环境或者是文化，给了你一种 **empowerment** 或者是一个空间。我就想问一下你，你怎么看待这个外国的影响，或者说你能够 **access** 外国的资源，对你做这么一个在地的女权主义，两者之间的关系？再加上你现在也不怎么回老家了，但是你现在回忆童年，虽然那个时候并没有什么女权主义思想，但是基于你的性别的很多经验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获得的。可能你现在拥抱的

这些思想，很难跟你童年时代的家人去传播，你怎么看待你想做的是这么一个在地的组织，用一个在地的人熟悉的话语去谈论一些在地的议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其实很多次都是 empowered by international、western，你怎么看待这个关系的？

A: 其实这个问题有点绕，我先说，我讲我自己最直观的感受，我记得在王老师的课上，她讲了一个概念，对我来说，在当时是非常难以理解的，就是讲社会建构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观念，其实都是已经存在的，你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你的，是你在你的社会化的过程中，去拥抱了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观念、想法，ideaology，什么什么。所有这些东西交杂在一起，成为了你。我那个时候是不能够想象的，因为这样的话，我的自主性在哪里？我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别人的。在慢慢的实践的过程中，会慢慢地能够了解、能够理解这一点，我也是非常认同这个社会建构论的。我觉得如果用这个方法来分析当时去投向了西方资本主义怀抱的我的话，在那个时候，我感受到的不舒服，是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我曾经拥抱过的那一个价值观的。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哪怕看到一丝来自其他文化的光明，我就会走过去。我觉得那个时候，还有一个点是，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非常单一化的，我没有办法处理非常复杂的问题。我被教成了这样子，每一个问题都是非黑即白的，它要么是好的，要么是不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原本拥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要求你一定要嫁一个男人，要稳定的那种思想，它不好的情况下，它对我造成压迫的情况下，我把它整个都抛弃掉，赶快去寻找那个给我一丝光明的东西，就是那个 western culture。我去特别活跃地在上海的外国人社区里面去交朋友，去跟大家一起玩，去跳舞，去喝酒。在短暂的一段时间之内，它是给了我一些慰藉的。因为我觉得在这里，我是被当成更有自主性的一个人来对待的。那个时间大概是在 2015 年吧。然后也会比较多地去泡吧，出去玩，各种各样的，不管是户外的还是 private 的活动，真的是去体验另外一种，之前没有体验过的生活方式。它给我带来，让我觉得自己好像自己的人生重拾了自主权的这种，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因为你仍然生活在这里，没有办法真的就完全抛开束缚你、压迫你的一切，除非你不在这个环境里生活，比如说我现在搬到哪里去，洛杉矶去，华人社区还是会给你这一套价值观的，是一样的。但在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认识到这一点，我看到了那丝光明，我就跑过去了。然后我在这丝光明里面，我慢慢地发现，其实它也只是有一丝光明而已。但那个时候我还不能特别好地去处理这种复杂的东西，就是有好有不好，你会非常严重地受到你身边的环境的影响，就是如果大家都特别崇尚西方文化的话，在你身边，你也会迫于 peer pressure，你可能也不会特别强烈地去批判它，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况且我好像是比之前要开心了，所以当时是这样子的情况，但是那个时候，我真的不觉得自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跟一群外国人的情况下，得到了女权主义思想的。我觉得我当时的很多的行为，都可以称得上是 sexist, racist, 还有 homophobic，肯定都是有的，还有对什么 lgbt 群体完全不了解，经常说一些匪夷所思，在很多人看来，特别是一些受到普世人权教育的这种人的眼里看来，应该是非常的荒谬可笑的情况。但具体这个思想是怎么样这么快就抓住了我，我觉得除了剩女是一个当时在压迫我的点，然后洪理达的书送到了我一个 feminism 的解决方案，它是一个基于 feminism 的 solution，所以我去拥抱了 feminism，一样的一个价值观就是，它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那既然这个东西它给了我解决方案，它就整个都是好的，大概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很好的一个点，我现在回想，就是洪理达的书给了我另外的一个视角，就是我以前所有受到过的教育，它都有可能是错的。就像我以前受到的教育是，我的国家应该是会为了我的利益最大化而考虑的，还有就是，全国妇联应该是非常为女性利益着想的，它是一个妇女组织，或者我们在我们自己日常看到的中文媒体上面，她们发的东西应该是正确的、真实的。我觉得我以前是保持着这种朴素的价值观的，但是看了洪理达的书之后就好像有一个雷，唰地一下劈了我。在我拥抱了女权主义之后，好像突然开窍了，被雷炸开，开始去寻找那种不一样的价值观。但我觉得跟那个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马上去拥抱西方文化那个是一样的，是在我被这个雷劈了之后，马上开始去寻

找的是一些完全跟我之前受到过的教育、经受的信息是相反的那样的信息，然后我就会很全身心地拥抱它，我觉得它说的就是对的，因为它说的跟我原来学的都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真正能够开始处理每一个问题的复杂性，每一个 **ideology**，每一个 **statement**，它后面都是有一个立场的这件事情，也真的是从 2019 年才开始的。所以我觉得能够拥抱女权主义，并且能够慢慢地去成长，也有这一本书带来的，把我原有的价值观劈开的，思维方式劈开的，带来的一些影响。然后也是在慢慢地接触批判性思维，接触事物的复杂性，接触很多很多跟之前的那种单一的非黑即白的价值观、教育方式不一样的东西。

B: 你刚刚说线下活动是让你可以更多地跟其他的人有交流，不像微信上面的单向的输出，你能够具体举例，比如说分享一些哪些你跟参加线下活动的人的互动，让你比较记忆深刻，不管是很好的，还是让你生气的、愤怒的、挫败感的？

A: 我现在能够想到的一个是，特别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大概在 2017 年的 7、8 月的时候，还是刚刚开始 3、4 次，来了一个中年女性，大概跟我差不多，三十多岁的样子。她当时是 **accuse** 我们在场参与的一个已婚男性，说你一个已婚男的，你来参加这种活动做什么，造成了大家对她的围攻。但是，即使是这样的情况，大家也都是非常理性的，就是跟在微信上面那种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都是很理性地在讲，你为什么这么说，你这样说背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为什么没有权利这样说他，你这样是人身攻击之类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让我讲具体的，我从哪一个人身上，哪一个场景上面得到了非常大的启发，我是没有办法讲出来的，因为我觉得特别是在早期，每次活动都给我很大的启发，但你让我具体举例，我是没有办法举出来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就是通过线下的活动，我才开始慢慢地组建起了我们现在的团队，因为每一个志愿者，包括核心成员，都是从这些活动上面来的，大家都是秉持着一个比较类似的价值观，不管是你要怎么样来做事情，还是你的目标具体是什么，然后才能够走到一起的。这个也是其中一部分。让我使劲去回想，我也想不出来具体是哪些场景跟言论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而且特别是最近，我自己不再主持这些活动。

第二段

B: 请问我们与平权跟国内其他一些关注性别的组织或者关注妇女权益的组织是什么样的关系，有没有一些互动、合作或者接触？

A: 现在的情况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组织，我们到现在才刚刚成立三年，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很自说自话建立起来的，所以在一开始并没有跟其他各地的女权组织建立特别好的联系，都是一种，我现在要做什么，那我就自己做，这样子的情况。现在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之后，虽然规模也不是很大，但是确实是到了一个规模，是需要突破的，感觉到了一个瓶颈之后，才开始希望能够跟各地的女权组织、妇女组织建立联系、寻求合作，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突破，所以现在还在积极地联系跟建立合作的过程之中。但目前还没有特别紧密的联系跟合作。

B: 请你介绍一下你跟我们与平权里的其他成员、志愿者的关系？

A: 我们现在是这个样子的，志愿者有两批，一批完全是在线联系的，主要是做一些报告跟公众号的内容的这样一批人，这一批人主要还是交托工作跟回收她们做出来的内容这样一个联系。比较深入的联系是每一年的 11 月，因为我们是 11 月建立的，所以会在 11 月给大家发一些自己做的纪念品，会有一些稍微大规模的互动。其他的时候，是在我有时间的情况下，我收到了她们发给我的整理出来的内容，我会跟她们做一个简单的交流，你做这个时候有什么感觉，有什么想法呀，会有一些这种类型的交流，但是毕竟是在线的，我觉得交流不是很紧密。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除了我之外，在上海还有 8 位志愿者，其中还有 2 个核心的成员，所以我们志愿者之间，大概就是每个月都会有一次线下的活动，这个活动是只针

对志愿者的，吃喝玩乐类型的，野餐、唱歌、吃饭、做指甲这种，反正什么事都干过了。觉得大家互相之间的 bonding，建立得还是比较好的，就不再仅仅是工作。核心成员之间呢，我觉得其实是有点类似朋友跟家人这样子的关系，因为互相是建立了一定的信任的，互相之间也会讲可能没有办法去跟别人讲的一些事情，一些困惑，或者是黑暗的想法。对于我来说，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这些志愿者特别是核心成员的存在，是因为在我做一个女权主义者，我的女权主义进化过程之中，有很多时候是非常痛苦的，这个痛苦是我在之前给资本主义打工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的，因为我在打工的时候我，我是一个 detached 的状况，我是在给别人干活，这个事情做得好了，我得到了肯定，要么是物质性的，要么是非物质性的。如果你不给我这些物质性的奖励，那我大不了就走人好了。可是在我做这个女权主义工作的时候，因为她是我的信仰，我没有办法说，我不给你打工了，现在撂下摊子就走了，这是不可能的，毕竟我们有团队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社群，这个社群就直接扔下不管吗，几千人就这样子了吗。所以在这个痛苦的类似蜕变的过程中是，是要有我们自己的，可以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的家人跟朋友这样子的存在，才能够支持我继续进行下去。不然的话，我觉得是可能会造成抑郁的后果的。

B: 你刚刚说有这么一些特别痛苦的点、过程，你能举例说一下让你特别痛苦的点在哪吗？

A: 我觉得所有的运动者都会面临一个问题是，会有一些无力感，自己的期待跟自己实际做出来的事情、产出，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还有，特别是像我们这种类型的政治环境，打压之下，是有很多很多 frustration 的。这些都会造成我们在心理上的、情绪方面的影响。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比较严重的点是在于，我的信仰，跟我的实践，跟我期待其他声称有同样类型信仰的人的实践的不太匹配的地方。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她是一个奉行女权主义的人，那她为什么还要去拥抱这种很父权制的、等级制的这些体系呢？在以前，在我的脑瓜里面，我是没有办法理解的。但我现在能够理解，并且也在尝试着去跟这些东西相处了，我觉得会好一点。但是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因为在我的脑子里面，它们是不能够自洽的。因为我之前讲过，我从小受到的价值观就是很单一的，不是说你应该有一个左，有一个右，可能有一个出来的人的时候，她可能有一部分左，一部分右，一部分中立，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没有左，也没有右，就完全只有一个方向。所以我受到的教育就是很单一化的，要么就是好的，要么就是不好的。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的思维比较简单，我只能处理很单一的东西，她是女权主义的，所以她应该拥有所有女权主义的特质，但是她又拥有了女权主义所反对的那些特质，那这是不自洽的，在我的脑子里面，她不应该存在，所以我需要一些时间、一些理论跟我也不知道什么类型的支持，让我去让这个东西自洽，而且让我能够跟她和谐共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社会化不完善的人才会遇到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很多运动者会遇到的问题，特别是跟人权相关的，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它不是一个鼓励你去相信的环境，它是一个鼓励你去互相不相信，而且现在有很多的社交媒体上面，我们看到举报的风气特别盛行，就让我想起了某一个历史时代的时候，那种揭发检举的情况。所以这样一个风气就造成了有点人人自危的环境。如果说我现在跟你是并肩作战的，然后我又没有办法相信你，这是一个很痛苦的感受。你要怎么样让这个事情能够变成一个我可以跟你并肩作战，我也可以 partially 相信你的情况呢？这个也是一个很需要去思考跟自己找到解决方案的点。

B: 你说和那些展现了一些跟女权主义不相容特点的人或者组织和谐相处，这个和谐相处是怎么实现的？

A: 目前还没有到完全和谐相处的程度，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用一个比较功利的想法去看这件事情的话，可能就更好了。我觉得有一点类似三四十年代上海地下党的那种想法，我不用非得特别地赞同你，但是我可以团结你的力量来帮我们新中国做事情。比如我举妇联为例吧，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妇联里面有一部分的积极的力量，她们也是希望能够为妇女权益做些事情并且能够达到积极的改变的，但是如果你遇到了某一个类似妇联这样的单位，它并没有这种

想法，但是它有一笔钱它要花，然后它想要做一些事情，这样的情况下它刚好能够用到你并且愿意用你这样一个看起来比较敏感的人的话，我觉得就可以牺牲一些部分，让它来出钱出 **publicity**，来帮我们做一些跟女权相关的事情。

B: 能不能分享一下组织从创建至今让你最骄傲的这个组织做过的活动或者项目以及一个让你最挫败的经历？

A: 我首先说，我没有特别挫败的经历，应该说，这个组织创建以来，我没有在这个组织里特别、这个组织做的活动有特别让我觉得挫败的地方，但是我自己的表现常常会有挫败的地方，比如说那种很单一化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没有办法去跟价值观不同的组织合作，在以前的时候，不知道如何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来达成一个更和谐美好的相处，这种对我来说都是挺让我挫败的，挺让我痛苦的。但是组织跟团队成员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让我觉得特别挫败的。就是好像有一种组织对得起我，我对不起组织的感受。但是你要说特别自豪的话，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活动做出来，我都觉得挺自豪的，我们能把它做了，能够有这么多人来，而且我们现在的人其实是越来越多的，特别是跟去年比。大家也能做很多的讨论，可能有一个特别让我自豪的，是我出力最多的，是我们去年的 8 月到今年的 3 月做的那个我们的故事，性骚扰的访谈报告。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同时还要维持我们的日常运营跟日常的活动，我去采访了三十多个人，最后形成了这个九万字的报告，而且能够有不同的形式、不同的类别，我们是有社会交往、网络、校园、还有职场上面不同的性骚扰故事，还有专业人士的访谈，最后能够把它做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因为确实是主要都是我自己在做的。我想一想，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我想起有一个算是不成功的案例，是我们之前做过一个跟性别暴力相关的心理互助小组。这个性别暴力可以把它算是稍微轻微一点的，也可以算是比较严重的。我们在这个互助小组之中其实是发现了很多问题的，但是由于我自己能力的限制，没有办法继续把这个互助小组做下去。这个是不成功的点，但是我不觉得这个事情让我觉得挫败，因为我们是草根组织，我们没有特别好的能力建设的培训，没有很多钱，没有很多 **network**，所以每一件事情基本都是实验着来的。这个东西实验完了之后发现，我们原来做的那个方式是不行的，那其实你继续做下去，硬做也是可以做的，但是那个效果肯定不会好。所以实践了之后发现这个形式不行，但是大概是有新的想法是，以后可以做成其它的类型。而且我们现在做的所有的活动类型，最后都是可以分出去的，就是不是非要在我们与平权这个大伞下面做，如果现在有有一个人，她有心理方面的背景，她想要去做一个自己的 **ABCDE** 心理互助小组，针对家庭暴力、性别暴力、性暴力的这种，我们都愿意提供任何的资源去支持，我们只要有，都可以提供。我觉得这种才是比较重要的，包括我在一开始做我们与平权这个组织的时候，我其实是希望有一个前辈来给我指指路的，这样我可以省很多的时间，我也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但是其实当时，我是没有遇到这样一个人的。现在我很乐于做一个我之前实验过的这样子的人，如果有其他的人想要做小组，或者其他小组想要做类似的事情，我们都很愿意把之前的经验分享给她。成功的经验是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经验，我觉得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B: 那从 2016 年创建开始到现在，组织有成长和变化，你自己有成长和变化，这个大环境，就女权主义实践来说，大环境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A: 我的感觉是，环境是越来越差了，但是你让我来具体地举例子的话，除了我刚刚说，在社交网络上的举报之风盛行，还有这几年对于同性恋的在社交网络上的出现的 **visibility** 的压制之外，我不够举出特别明确的例子来说，有什么事情它是能够表明我们的政治环境是越来越差的。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的，一部分是我刚刚说的那些表现，还有一部分是我的政治敏感度在慢慢增加的。我觉得女权主义给我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原来是不关心政治的，我觉得政治是跟我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在这样子的体制里面，政治是跟我们关系很小的，因为我们能够改变的东西太少。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也是很政治冷感

的，完全不去关心。但是，做了女权主义的工作、做了性别平等的教育的工作之后，我就发现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跟政治相关的。你如果还是采取那个鸵鸟的姿态，去面对所有发生在你身边的政治事件，完全忽视它的话，对于组织的成长、对于社群的成长，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所有你一定要去了解现在这个世界上在发生什么，中国在发生什么，它背后有什么问题，它背后有什么目的。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女权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是一种价值观，那它的价值观很多是可能跟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价值观是相冲突的，这也是为什么女权主义运动在中国开展的难度非常的大，哪怕我们在讲非常日常生活的女权主义，都是一样被压制、被污名化的一个原因。我可能没有办法跟那些从小家里就在讨论，我们今年投票给谁谁谁，议员他讲税务改革，那边讲提高就业率，所以我们应该权衡一下投给谁，跟那种是没有办法比的，毕竟我才只有可能这两三年去了解政治，去学习，但我觉得至少你要有一个开端，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做的。因为你要去了解，你才能够真正，哪怕你没有办法立刻改变现在身处的环境，你也知道你是被什么东西所影响的。这是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点，我增加了这个敏感度，我开始知道有哪些东西在影响我，我可以根据我自己知道的这些事情来判断有哪些东西现在可能是比较敏感的，是不好的，可能会对我和我的社群带来一些伤害或者风险。但我觉得这个也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会带来很强烈的自我审查。假如我们真的有一条线在这里，你如果是走到了这条线以上，你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可能马上就会被关闭或者是被取消的活动或者组织。那可能在强烈的自我审查之下，你离它很远的时候，你就已经停止了。那其实中间有一部分，你是可以游走的。但没有人告诉你，中间这一部分是可以游走的。而且这条线是随着不同的时间点在变化的，在不同城市的不同时间点，它也是一直在变化的。没有人告诉我们的情况下，出于一种 **overprotective** 的想法，不管是 **protect yourself**，还是 **protect** 你的团队，还是 **protect** 你的社群，你都会希望能够离它远一点。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我们的工作形式是有很大影响的。你做来去做还是这几个形式的事情，你会不会有其它的、更有冲击力、更有影响力的创新的，创新具体在哪里，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做出这种创新，怎么样创新，什么创新，哪些方面创新，这些我觉得都是被这个自我审查屏蔽掉了一部分。

B: 下一个阶段，你希望我们与平权有什么样的发展，展望一下未来？

A: 下一个阶段，我是希望我们能够孵化一些新的小组或者说组织，如果下一个阶段是指比如说三年。当然，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活着，如果要是不能活着的话，就希望能够孵化出更多的小组出来。我自己的想法是希望能够有一些，她自己有一个点，这个点是她特别感兴趣的，跟性别相关的，她想要去做一些事情的。她的 **idea** 是可以实现的，这样的情况下，不管她人是在什么地方，她的这个领域是不是我们之前关注过的，我都非常希望我们能够提供一些资源给她支持，让她去实践。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子实践起来的，慢慢做起来的，虽然做了不少特别长的时间，也算是初具规模。所以我希望她们，特别是在越来越严格的审查风气之下，能够有这样子的机会，能够有人在后面推她一把，或者是在前面拉她一把，让她把这件事情做起来，实践一下。这个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志愿者非常得需要各种类型的培训，我希望我能够找到一些资源，来给她们做一些培训，能够有这种比较多的 **capacity building**。我希望，志愿者来了，除了在跟我们与平权一起做事情这方面的成就感之外，有一些软件，它是可以带回去的。这个就是未来需要去找到的资源方面的东西。

B: 你做这个事情对你个人生活层面的影响？

A: 对我个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刚才讲了，在给资本主义打工的时候，是整个 **detached** 的状态，上班的时候是上班的状况，下了班之后，这个事跟我完全没有关系，不要再给我打电话，打电话给我我可能会骂你。但是做了自己的组织之后，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你一天 24 小时，只要你睁着眼睛，你就可以工作。这个是一个部分，还有就是，给别人打工的时

候，挫败感是没有这么多的。有一种我出去喝个小酒、蹦个迪，回来就没了这事，因为毕竟不是我自己的事。那现在每一件事都是我自己的事，都是我的社群、我的团队、我的组织，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我觉得我是负有一定责任的，所以我自己的错误带来的这种挫败感，是非常强烈的。当然也是有一些外部的影响的，比如说你突然之间听到，一个你比较，不算是特别熟识的、但其实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在某一处，他被刑拘了。这样子的事情，它可能在表面上对你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毕竟被刑拘的人不是你，而且你们毕竟不在同一个城市，也不会有特别大的交集，但这件事情就是会对你产生特别大的影响。一个是，我可以做什么呢？哪怕说他不是我私人特别亲密的朋友，他是我的战友，我可以为他做些什么，我可以充分相信这个人，他没有做什么危害社会的事情，他只是一个 **activist**，一个行动者，一个为了人权的观念去倡导、去做些事情的人。但你其实，如果为了自保，你是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的。但如果你不做什么事情的话，你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呢？这样子的事情会带来的这种类型的质问，其实是很让人难过的，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一些外部的影响是，毕竟你做这种跟人权相关的事情，你肯定会受到有关部门的访问，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也有可能被他们骚扰，莫名其妙地你的其他的远房亲戚都有可能被电话骚扰、被质询、被敲门，这种事情都是可能会发生的。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自己会有一种想法是，这个事情是我做的，你让我去承担责任，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可是这个事情不是其他人做的，他们为什么要为这件事情承担任何的责任？我为这件事情承担责任是因为我觉得它是对的，是我的信仰，我觉得这个是我所能做的最正确的事情，是有意义的。但是别人只是过着她自己的生活，她没有做什么让某些部门可以让它觉得是一个危害社会的事情，那她们为什么要受到连带的的影响？这个事情对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有些时候它会在经济上对你产生影响。比如说你发了一个广告，对方不让你发，你就没有办法卖东西了。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刚刚忘记了的那个点，我特别想要讲的是，拥抱了西方的价值观之后，它对我的女权主义思想有没有什么影响，以及去做慈善这件事情是怎么来的。我是在 2014 年 9 月的时候开始不做猎头了，不再做 **executive search**，做得不是很开心，跟当时公司的环境和经济环境都有一定的关系。那个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是，我决定自己背包去东南亚旅行，然后我就去了泰国、老挝、柬埔寨跟越南，一直在外面待了 4 个月的样子。那 4 个月对我人生的影响是很大很大的，它建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我的人生信条，我觉得 **Life is all about experiences**，人生一世，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大概能够得到的只是这些 **experiences**，就应该尽情地去体验。在那个时间，它也有一部分影响到了我后来去拥抱西方的价值观。其实一个人在外面背包的华人，特别是大陆人，是非常少的。所以我在背包的时候，遇到的大多数都是欧洲人，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是因为他们有 **gap year** 的传统，很多人跑到东南亚这种便宜的地方去 **gap year**。就接触到了一些跟原本我的价值观很不一样的价值观，去尝试理解，去倾听，去经验去经历。我觉得他们可能从小会接受一种你要去回馈社会这样子的教育，所以每到一个地方，经常会跟大家一起跑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扶植贫困青年，这个地方的餐厅你过来吃的话，它是有 50% 是捐给某一个农场的，经常会接触这种类型的东西。就会觉得这个事情是对的，是好的，而且是应该的。包括我们在路上，经常走到一个地方会把不想要的衣服捐给当地的专门有收衣服的那种地方，分发给当地的居民、农民、岛民。其实有很多都是西方人在那里运营的，就一直待在那里的。就在那个时候，可能建立了一种类似简单朴素的社会责任感的一个萌芽，就会想要在回国工作之后去寻找一些可以去处理的项目去做。我早期去做的教育的项目，除了有一个是做市集的协调，另外的基本上都是做英语教师跟英语助教，教过农民工小孩，教过幼儿园老师，教英语的这种事情，我力所能及的事情。然后才会慢慢地去认识更多的人，去实践做女权主义这方面的组织。刚刚还有一个点是，讲那个语言的问题，我是一个出生于中国农村的，我开始渐渐脱离农村，好像有一点类似那个 **resent**，也不能这么说吧。我的童年生活是非常快乐的，我觉得城市的小孩不会有这么快

乐的童年，假如我未来真的有小孩的话，我也希望她能够在农村长大，因为那个才是童年，对我来说。但是我可能可以 **resent** 的是一种价值观，那种对于暴力习以为常的价值观。还有就是东北是非常非常讲人情的地方，你要有很强的各种各样的 **network** 才能办成一个非常小的事。那个是我非常不习惯的，因为上海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正规的、讲规则的城市，这个是我比较习惯的，那这个可能也使我拥抱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讲规则，这个比较好说，因为你是讲关系的话，很多不上台面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去掌握的。谁有那个关系，谁拿到的东西就多，我觉得这也是违反女权主义的。说到这个语言，我觉得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问题其实是，我做的这个工作是，**public education, awareness raising**，做意识觉醒方面的工作，你是希望越多的人，看到你写的东西，接受你传达的信息，进入你的社群，这样才算是有效的，这样才叫做 **influence**。但是我们能够采取的话语，要么就是翻译过来的那一些学术性质的、我们平常的生活之中不会用到的一些话语，或者是那一些现在的传统文化赋予了它的一些特殊意义、一直是处在一个很传统的、单一的 **narrative** 里面所讲述的话语。这两种话语是很难兼容的，你在讲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么 **compromise** 一群你的读者，来用那种更专业的、它的每一个词语、它的意指都是有非常严格的代表性的学术性的话语，或者你要 **compromise** 你自己想要表达的意义，你要用跟你想表达的意思类似的、产生于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带有一些父权色彩的话语，那你具体应该使用哪一些呢？或者说，我们应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要做女权主义知识生产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如果要做面向所有大众的女权主义知识生产的话，用这种学术性的话语，对于我们要面向的大众来说是不是太过艰涩了？如果要用这种产生于父权体制的这一些带有父权色彩的话语，那是不是它就不够女权主义、不够彻底？还是说，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机会，去把女权主义学术的话语普及到所有的公众当中，大家都能够理解，也都能够熟练地运用。哪怕不能够熟练地运用，她能够理解这些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她能看得进去。或者说，把这些原本产生于传统文化的、带有父权色彩的这一些词语，把它革新成为新的女权主义的词语，更加 **gender equal** 的，更加 **neutral** 的一些词语，而不是那种有一个特定 **narrative** 的词语。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想要去做意识觉醒，想要做 **advocacy** 的人，特别是在中文语境里面的人，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我自己也觉得很矛盾，不知道要怎么做。

A: 最后我来介绍一下我自己。我们与平权是一个 2016 年 11 月开始的组织，我们有几个部分的工作，一个部分是线上的，我们有一个微信公众号，也叫我们与平权，每一个星期都会发一篇原创的性别相关的文章，这篇文章可以是针对于个人的访谈而 **generate** 的一个个人经验的故事，它当然都是跟性别相关的。还会有一些电影的分享，书籍的分享，还有群众的大家一起的分享。每周二我们还会去分享跟性别相关的书籍资源，电子书，大家都可以直接去下载的。这个是线上的部分。线下的话，我们现在是有三种形式的活动，也就是在没有外力影响的情况下，每个月大概会有三次活动。有一次观影会，一次讨论会，还会有一次通识性的问题的讲座。除了这两个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报告，上一次做的是从 2018 年的 8 月到 2019 年的 3 月做的一个关于性骚扰的访谈故事集，其中有 21 个人经历的经验，这个 21 个人经历里面有 19 个是被骚扰者的经历、2 个是骚扰者的经历，它分成 4 个部分，有社会交往、网络、职场，还有校园方面的。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是有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也特别感谢这些人能够接受我的采访。同时还有 5 个对专业人士的访谈，包括了培训的、校园方面的、法律的、心理的、学术的。这个集子其实是受到去年中国的 **metoo** 运动的影响，既然我们有一个组织，我们与平权，我也希望能够代替这些没有办法在公共场合发声的人，帮她们把声音发出来，把她们的故事讲出来，这个大概九万字的报告代替所有的这些人对于 **metoo** 运动的参与。还有一个我们现在比较力推的部分是我们现在会有关于性别认知的一些工作坊，这些工作坊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培植未来的社群领袖，希望她们能够获得一定的能力或者是 **mindset**，哪怕觉得我们的工作坊做得不好，她觉得我们以后做工作坊一定要做得比

你好,一个失败的案例的借鉴也可以,希望她能够在我们的启发,在这些工作坊的培训之下,能够做自己想要做的跟性别相关的小组,或者是社群。未来呢,我觉得每一次都是想到要做什么,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然后就跳进去了,发现这里面还可以游泳,挺好的,那就去做了。目前挖了这么多的坑之后,我觉得精力有一点分散,所以也希望有人能够过来把其中的一个坑拿走,开拓成更大的一个泳池,然后她来做。我忘记提了一个是,我们原来就有一个图书角,是放了很多曾经在 95 年世妇会前后、跟某一些时间点前后能够发表出来的跟性别相关的特别好的、特别是译解回来的书,它可能只出了一版,之后就不再有了,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有限的机会之下,把它们买回来,做一个图书角,给大家分享,谁想来看都可以来看。之前我们在龙华这边的一个空间里面放了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它关闭了之后,最近应该会跟另外一个空间合作,到淮海中路常熟路附近一个看起来逼格特别高的空间里面去放在那边。以后会在公众号上面发出来。